

段怀清 著

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

王
韬

 复旦大学出版社

“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项目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

段怀清·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段怀清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
(“薪传”现代文学研究平台系列)
ISBN 978-7-309-10889-7

I. 王… II. 段… III. 王韬(1828~1897)-人物研究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0123 号

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

段怀清 著

责任编辑/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83 千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889-7/K·488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2006年,教育部批准聘任王德威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领衔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我想说,这是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它对于提升我们学科的品质,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创建一流学科,直接起了推动的作用。

我只想举几个例子,说明德威兄对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2007年春,德威兄到任以后,着手筹备一系列有影响有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2008年6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举办“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教学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和讨论了海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教材建设,这是一个历来被人疏忽、又能够引起许多话题的主题,给人的启发可以想见;10月,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张新颖、张业松、严峰、李楠等教师应邀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参加“呈现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德威兄的精心安排下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理学院等进行学术交流,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以集体的形象展示于国际同行的面前;2009年1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台湾“中研院”、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中心联合举办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3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在香港联合举办“中国当

代文学 60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家王蒙、王安忆、朱天文、北岛、黄春明、严歌苓、平路、钟晓阳等出席了会议，成为香港学术界一件盛事；2010 年 6 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新世纪文学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的哈佛中心和复旦大学举行，邀请了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骆以军等知名作家和一批年轻作家同登讲堂，商量探讨新世纪十年的文学，会上高潮迭起，新见纷纭，直接推动了新世纪文学的研究……这些学术活动都有许多重要学者参与研讨，而德威兄是这些学术活动的灵魂，从策划主题到组织人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不仅如此，他把长江学者的科研经费完全地奉献出来，用于补贴会议费用和邀请复旦教师出国之用；还不仅如此，每次学术活动中，他都带头发表新的学术论文，以卓越见解引领学术前沿风气……身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讲座教授，美国、中国学术论坛上的重要活动家，跨华、英两种语言著述领域新作不断的学者，自身工作的繁忙可以想象，但一旦承诺了复旦大学的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之岗位，就以如此精力投入经营，苦心扶植、提携后学。我作为协助他工作的合作者，愿意把这种感动公布出来，不仅仅是为了表彰，更重要的是，德威兄为当代学术界确立了一种人格风范，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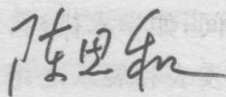
在德威兄的带动下，许多海外的青年学者与复旦的联系也紧密起来，由此展开了多元的校际交流和系际交流，复旦中文系先后与美国的威斯理学院、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等学院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者的往来逐年增多。多年来，复旦中文系一贯执行鼓励研究生外出深造的方针，许多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复旦学子脱颖而出，他们始终与母校保持了亲密联系，随时交流、参与复旦中文系的各种活动。他们在海外做出的学术贡献，同样也显现了母校的根基培育之果。

这几年来，复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同事们一如既往地发奋著

述,在积极展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视野渐宽、新见频发,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三年中,除了个人出版的学术著作以外,我们还先后编辑出版了复旦师生现代文学研究的集体成果“薪传”丛编四种、国家社科项目“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五种,都反映了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整体风貌的学术成果。自德威兄担任了复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以来,我一直想再策划一套新的学术丛书,扩大原来著述范围,以体现跨国合作的广阔视野,反映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新的学术面貌。于是,我冒昧提出一个“平台”的理念。平台一般只是指高于附近区域的平面,一个广阔但有范围的空间,现在常用在比较抽象的学科建设领域,指的是某种学科发展的空间,如学术机构、学术活动、论坛、刊物,等等,供学术成果的公开发表和展示之用。依我的理解,丛书本身不是平台,而是在德威兄引领风气之下,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空间扩大了,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交流和学术会议,由此又引出新的讨论话题和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整体的学术发展过程都体现了“平台”所展示的实绩。

新的平台丛书目前还只是一个设想,要实现这个设想恐怕还要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不打算事先策划什么主题,只想提供一个平台,吸引更多的著作者来自由加入。作者的队伍有所扩大,不仅仅是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同仁,也包括在复旦中文系学习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包括曾经在复旦中文系学习过、而今在各自岗位从事研究的学者,还包括从复旦到国外去留学攻读学位、而今在海外高校里工作的学者,也包括在复旦中文系兼任过各类教职、上过系列课程的海外汉学学者,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来体现复旦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丛书的内容和主题设计方面别无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是新完成的学术著作,而不是旧著的重版或变相重版;时间上也没有特别催促的意思,希望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慢慢地积累数量,渐渐地形成规模。

2007年,在“薪传”丛编出版时,我写过一篇序,文章中说:“希望将‘薪传’作为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称。……传统就是一道水流,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信息,传布开去。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是由前辈学者辛苦开创而成,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其传统,继往开来,代代承传。所以,‘薪传’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关键词。”现在,我把这套平台丛书同样纳入“薪传”系列,也就是想再强调一遍:薪传,是我们的关键词。



2010年11月10日临晨,

写于香港城市大学德智苑

目 录

前言 逃离、漫游及其之后：王韬的文学实践与文学意义	1
第一章 王韬的翻译	51
一、王韬通晓西语考	54
二、王韬与晚清翻译中的“笔述者”	63
三、西学与西方文学	80
第二章 王韬的报章文	103
一、王韬与晚清社会的公共言论空间	107
二、王韬报章文的思想探索	116
三、王韬报章文的文体试验	128
第三章 王韬的上海叙事	135
一、王韬上海叙事的书写形式试验	139
二、都市女性的发现与晚清的都市叙事	155
三、王韬与“上海文艺”	172
第四章 王韬的小说	181
一、王韬与傅兰雅的“时新小说”竞赛	184
二、写实与虚构：《笙村灵梦记》考论	209
三、《纪日本女子阿传事》：异国新闻事件的小说书写试验	242
四、中国版的“约伯记”？试论《梦中梦》	270
附录	299
附录一 本书参考使用的王韬部分著述及出版收藏情况	300
附录二 王韬《淞滨琐话》与邹弢《蛛隐琐言》相关篇目对比校勘表	302
参考文献	339
后记	345

现实生活中的王韬(1828—1897),曾经有两个标志性的姿态,一为逃离,一为漫游。前者发生于1862年10月,王韬以“通匪”罪名遭通缉,在英驻沪领事馆避住一百余日之后,得到英人帮助,仓皇逃离上海,乘船南遁香港。后者发生于1867年年底,王韬应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佐辑群书”之约,往游泰西,就此开启其人生事业的全新篇章和更高境界。这两个姿态,不仅真实地见证记录了王韬一生中所经历的两次重大生活事件,更重要的是还彰显出王韬内心深处所经历的两次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心理事件,标志着王韬所置身的生活空间以及其自我精神心理空间乃至文化思想空间的巨大改变,并预示了与这两个姿态相关联的所谓“王韬道路”的阶段性的调整,以及之后可能的走向。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姿态当中,如果说前一个姿态关涉着王韬与现实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后一个姿态则昭示出一个醒目事实,那就是王韬就此与中国之外的真实世界发生了实际的接触与具体的交流。而在一路西行的漫游途中,王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自由的、可交流的、超越民族国家之权力政治与文化隔阂而建立起的符合人性和满足彼此认知需求的关系。这种关系,与王韬时代的现实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明显不同:现实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隔膜的、紧张的、不信任并且缺乏真正了解对方兴趣的,而作为思想个体与经验主体的王韬,却对这一全新世界充满好奇,急于体验和了解认知对方,并颇为自然地超越克服了国家政权之间的敌意,沉潜深入到“国家”这一概念性存在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对话交流的空间领域。而王韬的一路西行,从文化及文明空间上来看,在越出传统的中华文明圈之后,途经东南亚地区,一路至此,王韬的相关记录文献都没有表现出其内心世界中经历的太大冲击波动——东南亚地区

以及红海、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区，在王韬此行的文化及文明体验中，更多扮演的是一种从中华文化文明圈到泰西文化文明圈的过渡角色。之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新世界，呈现在了王韬眼前——由此开始，王韬的世界观，开始在传统的中华天下观、当时少数口岸先锋知识分子初步形成的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观以及以泰西文明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导引及模范的西方世界观之间拉扯纠缠。空间意义上的全新体验与实际发现，不仅在经验意义上一点点充实着王韬在上海时期以及香港时期对于西方世界的种种想象，而且也在不断解构并重新建构他对于“世界”的新的认知，而历史地看，这些认知明显超出了同时代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自觉和知识结构。至于王韬在《六合将混为一》^①一文中所表达的“圣人出而四海一”思想，或许会被认为是对其泰西之行所形成的新的世界观的一种反动，是向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一种依靠，甚至于他将人类文明的发展按照其形态划分为草昧之世、中天文明之世、终质异尚之世以及郁郁彬彬之世的思想来源，亦有明显的中华文明观的资源与思维背景，但其中泰西之行所产生的影响仍清晰可见。

西 笼统而言，新的世界或新的空间——无论是 19 世纪 50 年代的上海、60 年代的香港、60 年代末的泰西世界，还是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的香港，乃至 80 年代直至 90 年代末的上海——首先给予王韬的是新的生活经验，而这种在开埠口岸以及域外世界长期的新的生活经验，又为王韬观察、议论及批评中国内地的主流生活提供了经验自信、知识勇气和思想力量。与同时代以及稍后时代的那些思想先锋相比，王韬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的一些思想言论前卫、尖锐和具有高屋建瓴、关涉全局式的整体性与前瞻性，而且还因为他的这些思想言论，不少来自他与西方知识分子及西方社会长期直接接触的个人经验，以及其个人持续为之的社会实践（譬如独立报人生涯和独立出版生涯等）。换言之，王韬的改良思想言论，不是仅仅来自泰西新的书本化知识的启发触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 114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 1 月，上海。

动,更多是对在生活实践层面所日积月累的新的经验、新的方式、新的途径以及新的范式等不断总结、提升、改进并重新付诸实践的自然产物。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所谓“王韬道路”,亦就打上了鲜明的实践印记。

王韬在上述每一个新世界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其泰西之行——也就是他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视觉经验与听觉经验,对于他个人以及晚清知识阶层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这些经验本身所可能产生的联动效应,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因应这些经验,特别是由这些经验所引发的对于晚清新知识、新思想的生成方式的思考。王韬的上述经验,包括其西方经验,更多不是来自文本化的西方世界及文本阅读,而是来自他的耳闻目见、身体力行。如何将来自个人生活中的经验整合到现有知识体系之中,或者说如何在现有知识体系之外生成新的知识,并重新建构现有知识秩序,或者说甚至对传统之知识生产方式与途径亦产生一定怀疑,开始在文本化的历史经验之外,发现并提升日常生活世界与现实经验世界在知识生产,尤其是新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这不仅影响到王韬及其时代的先锋知识分子们对待本土传统文本化的知识体系的方式,而且还将影响到他们对泰西世界的认知方式,并探索出一条接触、认知一个新世界的新方式。

而对于这两次生活事件及其深刻影响最先做出描述评估并反复叙说者,不是别人,正是王韬自己。在《王韬日记·悔余漫录》、《王韬日记·悔余随笔》、《漫游随录》以及与友人往来书札等不同文本中,王韬都曾从不同侧重点叙述过1862年的“逃离”和1867年的“漫游”。比较之下,前者行动时的仓皇以及当时的王韬对于未来前途的未知迷茫,与后者行动时的豪迈俊朗壮怀激烈,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心理反差,亦见证了王韬从内地中心逃离时的惶恐忐忑,以及经过香港的多年适应与自我调整之后重新面向一个全新未知世界时的自信与勇气。而以这两个时间节点为中心,考察分析王韬在这两个节点前后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对于解读王韬的现实人生和精神世界所发生的种种波动变化,以及这些波动变化在王韬的思想层面及现实行止方面所引发的关

联影响,包括对于王韬的著述事业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探索。

王韬曾在不同文本之中,描述过自己当初逃离上海、南遁香港的经历。

首先是《悔余漫录》。

1862年10月的逃离上海,对于王韬心理上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创伤记忆”,看起来明显超出了王韬自己最初的估计^①。《王韬日记·悔余漫录》中虽未言明南遁缘由,但对事发仓促中隐身英领事馆、直至南遁香港的经过则有较为细致的记载:

同治纪年岁次壬戌四月二十日(5月18日):抵沪,得见慕君维廉,即在黄春甫(铸)家暂住。

二十五日(5月23日):至麦领事署。从此避置一室,经一百三十五日。

闰八月十有一日(10月4日):辰刻,麦君高温来,述麦领事盛意,令余即刻前往香港,因偕至怡和行鲁纳火轮船,英人密斯恩开亦同去,待余之厚,殊可感也。

十有二日(10月5日):巳刻。启行。余此次仓猝登舟,一物未携,窘苦万状。

……

十有八日(10月11日):申刻,抵香港。^②

① 王韬南遁香港期间,并非全然不能踏足内地。其《悔余随笔》中即有关于与友人访羊城广州的记载:“海峤始寒,与梁文盛作羊城之游,得览伶仃洋、虎门诸处。……城中庐舍鳞比,商贾辐辏,民物殊有丰阜之象,洵为炎方一都会也。”(王韬:《王韬日记》,第203页,方行、汤志均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7月,北京)

② 同上书,第195页。

从上文所载推测,《悔余漫录》大概为王韬事后追忆录记,并非当时日记,故显简略,其中亦不涉及当时困居英驻沪领事署之生活细节及精神状态。倒是对于给自己提供庇护的传教士慕维廉、英领事麦华陀^①等,王韬满怀感激。只是人在困窘惶恐之中,难以平静详述。故南逃事简而到港之后述则详。直至莅港十日后(10月19日),日记中方有关于南行之感喟抒发。“偶得五律三首,附录于此。居忧之中,安敢作诗,然以写我苦衷,不妨言之凄恻也。”^②此亦可见王韬当时还来不及全面评估南遁对于自己所造成的影响范围与程度,更不会预见到二十余年之后,他才有机会重返故里。

其次是《悔余随笔》。

对于此次南遁,初抵香港的王韬,并没有将此视为自己逃离中心主流、自我边缘化的肇始。他甚至坚持宣示“避迹非逃世”,但这种自我宣示的立场,或者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哪里抵得住“已知成弃物,何得尚谈兵”^③之后的失落、感伤乃至迷茫。故有“杀敌雄心在,怀乡噩梦惊”之类的矛盾纠结。从《悔余漫录》是年10月19日所录五律三首可以推知,此时王韬尚在自我辩护、自我宽慰与前途渺茫、所求何在的进退两难之际。所谓“世乱言皆罪,涂穷迹已沦”、“浮名复何益,文字竟为灾”之类,从后来学者考证出《上总理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肇均稟》的“苏福省儒士黄畹兰卿”即为王韬这一坐实结论看,王韬上述诗句文字,不过是其内心深处并不甘心自此告别主流中心王道正统,流落民间僻远化外之地心态的一种反映而已,也说明南遁之初,王韬并无就此别求一条新路的足够准备或精神自觉。“逃离”就此而言,亦显然尚

① 按,《悔余漫录》中此处麦领事,当为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即传教士—汉学家、墨海书馆馆主麦都思之子)。另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85年10月,北京),麦华陀正式被委任时间为同治九年十二月(1871年1月),王韬事发南遁之时,担任英驻沪领事者为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悔余漫录》中如此记述,似亦可证明此为后来所追记。

② 王韬:《王韬日记》,第197页,方行、汤志均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7月,北京。

③ 同上。

未成为王韬一种新的思想与人生起点——他尚无与过去的自我及世界彻底切割了断的明确意愿和足够勇气。所以，尽管有“离家成死别，蹈海岂生回”的惨痛感受，却无意亦无力就此摆脱“吾主终明圣”一类的意识心态之纠结。

另外在《弢园老民外传》、《遁窟谰言·卷一·天南遁叟》以及与人往来的书札等文本中，亦有不少述及此间王韬心迹及随着时间而生发的细微变化。在11月3日寄杨醒逋的一封书札中——也就是南遁月余后——王韬描述了此行前后详细经过。这封书札，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王韬南遁之细枝末节，更关键的是，从这封事后月余的书札中，亦可窥见王韬此时的心态情绪之真实状况。这封书札，大抵与《悔余随笔》中所录《七律四章》、《五律四章》及《偶感》等诗在心态情绪上可成互文。

在寄杨醒逋书札中，王韬追述了初抵香港“进退失据”的生活窘迫，“无奈囊橐羞涩，面目遂形寒俭，踣凉窘困之况，难言万一”^①。不过此处所言，多涉及日常生活层面或由此而引发的心绪反应，并无过多关涉精神结构层面的困扰。“终日独坐，绝无酬对，所供饮食，尤难下箸。饭皆成颗，坚硬哽喉，鱼尚留鳞，锐芒螫舌。肉初沸以出汤，腥闻扑鼻，蔬旋漉而入饌，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咸之异嗜。”^②这种生活习惯或个人处境方面的牢骚，尚在人之常情之中——以王韬原本长期在江南地区生活所形成的饮食习惯，初到粤港，生活上有此种种不便，说不上过分挑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种生活上的不习惯，极容易勾引起王韬这种来自文化繁盛之地的文人才士对于岭南化外之地的历史记忆及相关联想。而鸦片战争以来岭南地区的对外通商，尤其是香港的割让等，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原本因为“风土瘠恶，人民椎鲁，语音侏离”而引发的“偏见”。这种“偏见”，包括历史上即已有之的“内地中心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精英意识、文明优越意识及王道正统意识等。置身此情此境之中的王

① 王韬：《王韬日记》，第199页，方行、汤志均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7月，北京。

② 同上。

韬，难以“随遇而安”，并渐生“哭亲思家”之种种离情别绪，并由此而作出“从此潜心晦迹，隐耀韬光，不复出而问世，席帽梭鞋，荷锄担耜，时与野夫樵叟课雨占晴，酬歌答话，以毕此余生而已”^①的心愿表示，其中所谓归隐民间之类，不过是古来士大夫文人遭遇世间挫折、人生困顿之时常见的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策略，或为自慰，或为自嘲，抑或为因应外部世人的方式而已。其中固然有合情合理的因素在，甚至亦可视为当事之人当时的一种真实心态，但这种自我心态具有极不稳定性，它会随着当事之人社会处境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甚至改变。

无论如何，王韬这封书札中所述种种，并没有涉及对于未来人生富于超越性的想象，也不见对于过去的人生及自我，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深刻彻底的清理反省及自我觉悟。换言之，也就是还没有表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对过去的文化自我与精神自我的怀疑叛逆。相反，一旦这种初抵异域的陌生感或不适感得以消解之后，重新回到过去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似乎亦显得颇为正常。

而王韬这一时期的心态心境，在《悔余随笔》中所收录的若干律诗绝句中得到了更多表达反映。

在赠仲楚香的七律四首前，王韬自谓“自经窜逐，无意于浮荣矣。但得饱吃饭，闲读书，了此余生，得还故乡，亦已幸矣”，并吟咏道：“窜逐无端已自伤，那堪重入旧欢场。更怜意气非畴昔，况复艰难托异方。吴苑樱花成转曛，蛮乡风雨割愁肠。酒杯逼仄乾坤小，沦落天涯泪数行。”^②诗中的沦落失意感与异乡漂泊感浮泛于字里行间。不仅如此，诗人还将昔日沪上的生活描述成为一种惬意自如的“欢场”，而将初入之香港视作“蛮乡”^③，这种比对，一方面反映出王韬此时无法排遣的思乡怀旧情绪，另一方面亦显示出他当时无法可能亦不愿认同香港式的以泰西为主导的“华洋杂处”的政治—文化体制与生活环境，以及难以融入当地生活之中

① 王韬：《王韬日记》，第199页，方行、汤志均整理，中华书局，1987年7月，北京。

② 同上书，第203页。

③ 将此时寄籍所在之香港，视为蛮乡外化之地，在王韬此间诗句中不时显见，譬如“兵戈满海内，惭此走偏隅”、“放逐蛮荒吾敢憾，养生正欲托严阿”等。

的孤独感与零余感。而支撑着这种“难以融入”的姿态立场者，可能就是王韬依然较为顽固地抱持的王道正统、华夷之辨以及中原文化优越论等观念。

最能够反映出王韬此时依然不能改变自己政治—文化上的正统立场者，当属四首七律之第二首中的“雅慕灵均比兴工，谁知草野抱愚忠”一句^①。不仅如此，此诗中还对王韬未来即将展开的著述事业有所议论评价。“已叹功名成画虎，敢轻词赋薄雕虫”，一方面表明处身香港的王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功名事业，对己而言可能已成镜花水月，但他也并没有就此而坚定地选择著述来作为自己余生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推测并不完全是因为观念认识的问题，还与职业文人与职业著述在当时的香港及上海，依然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一现实密不可分。而晚年返沪定居之后的王韬，之所以能够在格致书院之外，以著述出版作为自己的事业基础，则是因为历史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沪上的著述出版已经初步实现产业化与职业化。

故园、国族，生活意义上的怀乡，与文化精神意义上的“怀乡”交织渗透，共同编制出一道道情感精神之网，一方面让网中之人感觉到有所归属的安全感，尽管这种安全感未必全然真实且现实，同时又将网中之人牢牢羁绊，无意亦无力对网络之外的空间世界产生认知探索及认同融入的欲望冲动。

南遁并不是流放，而是王韬在外人庇护帮助之下逃脱官府通缉追捕的一次避难流亡，这既是事实，亦是王韬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的自我认知。但这种认知似乎在王韬抵达香港之后不断自我辩白的文字中一点点被自我稀释消解了。“逃离”事实上是王韬自 1849 年进入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协助西人翻译宗教典籍、西学著述及撰述宣道文章行为之后的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

^① 初抵香港的王韬，诗句中亦不时见到王师、孤忠一类的政治—文化词汇，这种词汇出现的频率，似比其南遁之前在沪上生活时期的诗句中出现之频率还高。“喜听王师下吴越，家乡无恙算归期”，“书生思报国，徒此抱孤忠”。此类诗句，固然可见王韬心迹之一斑，但更多恐怕还是出于一种自我掩饰或带有“危机公关”性质的自我表白辩护。